

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

汪丁丁^{1,2}

(1.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000; 2. 东北财经大学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本文在界定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分别藉由人文学科和科学的宗旨进一步阐释社会科学,通过对比中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传统来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任务在于感受重要性,抓住问题意识并能够运用西方合法的学术规范来表达。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意义;根本问题;表达

中图分类号: C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08)10-0003-11

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

我首先强调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人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美国人或俄国人或印度人的。其次,需要说明“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整体中的位置,与它的研究者的身份无关,它是普适的。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但它又有“科学”的性质,或者说它是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德文的“人文学”通常翻译成“人文科学”,因为德语的“学”已经有了“系统研究”的意思,这是德语学术的传统,或许这里并不发生哈耶克曾批评的“科学主义”倾向。但是,在英美学术传统内,我们不能将“人文学”(humanities)翻译为“人文科学”。因为英语的“科学”,包含了远比德语的“学”更“自然科学化”的意味。若是我们用英语的“科学”所指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则很可能会扼杀了人文思想。有鉴于此,林毓生教授将“humanity”译为“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

由于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一门学问,如果我们观察社会科学的历史,不难看到,它的研究方法也总是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人文学科的方法之间徘徊。我们说,这是社会科学的尴尬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汪丁丁(1953-),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dingdingwang@pku.edu.cn

处境——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叙事传统之间。

二、人文学——呈现意义

哈贝马斯曾这样定义“人文学科”——人文学的主旨是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假如你对自己提出诸如“我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类问题，你就进入人文学科的领域了。人文学的功能、目的或宗旨，就是“呈现意义”。

钱穆在 194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个性和“群性”两个词来描述人的性质，他说人性既有个性又有群性。今天，我们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种。第一，因为是“动物”，所以每一个体不可避免地具有“个性”（individuality）；第二，因为是社会性动物，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群体性，也可称为“可社会性”（sociality）；第三，因为是哺乳动物，所以有“情感生活”——不论那是个体的情感还是群体的情感。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人文学科所致力于呈现的意义，是指人的个性与群性在各种情境之内发生的“问题性”。

1. “意义”的解读

自 19 世纪末以来，很多西方的数理学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意义（the meanings of meaning）进行过界定。在我所阅读过的此类文献中，一位女性哲学家对意义的解读打动了我的心，这就是 Agnes Heller 女士的存在哲学诠释理论。

Agnes Heller 女士是一位杰出的存在哲学家，正是她把生存哲学的伦理学引入“当代”。Agnes Heller 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坎坷，她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之时，她是布达佩斯特大学的哲学教师，而在那之前，她是卢卡齐的助教；2004 年，Agnes Heller 被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聘为继任阿伦特之席位的道德哲学讲学教授；2006 年，Agnes Heller 获得丹麦金额最高的文化成就奖——索宁奖。

Agnes Heller 对意义的解读能够打动我的理由之一是，她的存在哲学诠释理论同中国的儒家传统十分接近，即着手于考究“人活着的意义”。Agnes Heller 于 1980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存在哲学著作，用三个维度从存在哲学角度诠释意义从而接近了中国哲学。代表中国儒家传统主流，对中国人活着的意义阐释得较为清楚的是李泽厚。李泽厚将中国人活着的意义阐释为“吃饭哲学”，即一种存在性的哲学或是一种生存性的哲学。同李泽厚所研究的中国哲学类似，法国学派的布迪厄在其所著的《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一书中从“纯粹的逻辑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角度讨论意义从而接近了中国哲学。Agnes Heller 的存在哲学理论、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和李泽厚的吃饭哲学理论，三者从不同角度诠释意义却都会师于中国哲学，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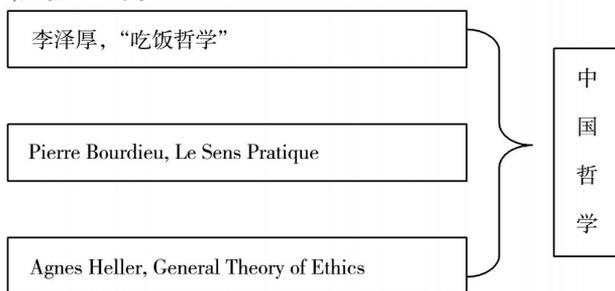


图 1

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是西方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Agnes Heller: General Theory of Ethics,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88.

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和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学四讲》、《世纪新梦》、《论语新读》和《己卯五说》等。20 世纪 50 年代，李泽厚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吃饭哲学”：李泽厚不认同推崇生命哲学的新儒家，认为他们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吃饭哲学”。他认为“吃饭”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的生存技能，它也是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前提。而在“实用理性”方面，他把马克思、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进行综合、改造、发展成为“人活着的命题”即“吃饭哲学”。此外，与“实用理性”相对应的，李泽厚还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认为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Pierre Bourdieu, Le Sens pratique, Paris, Minuit, 1980. 法文版为《实践感》，英译本为《实践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

2. “情境”的解读——意义的五个基本假说

人文学科所致力于呈现的意义,是指人的个性与群性在各种情境之内发生的“问题性”。“情境”一项, Agnes Heller用三个维度诠释了意义,这三个维度构建了“问题性”发生的“情境”。

Agnes Heller对意义的三维界定:

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这是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之一。Agnes Heller的贡献在于用三个重要的维度来诠释美好生活的意义——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如图2所示,这个三维空间的坐标原点是 good life,中文表达为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是值得人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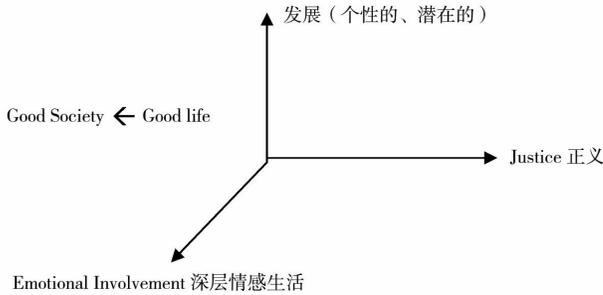


图 2

基本假说 ——意义的阶梯不能够完整地呈现。

基本假说 ——当个体被“comer”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冲突上的不同意义或不同原则,即他感受到痛苦,而这种痛苦导致其抉择。抉择是一个“断然一跃”的过程。抉择的结果有两种——个体或者升华,或者沉沦。这就是文化创造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发现意义的过程。

基本假说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权利。

首先,每个人都拥有追求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天赋权利,而能够满足每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就是美好社会(a good society)。美好社会是以每个社会成员的美好人生为基础的。基于美好生活的目的, Agnes Heller构建发展、正义和深层情感生活三个维度用以诠释人的意义。

(1)第一个维度——发展。

发展是指人的潜在个性、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每个人都是一颗惟一的种子,具有“双重的历史偶然性”。作为惟一的种子,他被抛入一个不能自主选择的家庭和社会,一旦出生就会生长,继而寻求发展,寻找机遇激发其潜能。(当然,很多人在许多情境中没有这样的发展条件,即被他所在的社会忽视了。比如肢体有缺陷的人也有发展潜力,也可能成为不需要依赖肢体领域里的天才,如数学天才或音乐天才等等,但却可能因为某种社会情境而失去发展机会。又比如虽然已经考取一所重点高校却因户籍限制必须缴12万元的赞助费才能入读的农民工子弟,最终选择放弃,对他而言,社会忽视了他的发展权。)

什么是发展,用康德在其理想国中的表达就是“Everyone is end not means”。即,“没有人有权利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的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是指每个人无论是受其形体、智力先天缺陷的困扰亦或是受后天情境等因素的局限,他总有发展的潜力和充分发展的自由。

(2)第二个维度——正义(Justice)。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3)第三个维度——深层情感生活(Emotional Involvement)

深层情感生活,这是只有女性哲学家才能感受到的维度。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深层的情感”;二是“情感卷入”(involvement)。人类的情感生活不单单是满足个性情感,更是寻求群体情感的慰藉。个体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其自身生活的意义,还包括个体同与其有关联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诸多深层情感。个体只有被卷入情感的深层联系(例如亲情、友情、爱情)的时候,个体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基本假说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这个三维空间内为自己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过程就是美好社会的落实的过程。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追求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权利,表现在由发展、正义、深层情感生活构成的美好生活的三维空间中,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坐标。例如,甲关注正义,那么他的坐标定位在

以下从意义的五个基本假说展开:

基本假说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权利。

基本假说 ——社会每一个成员在这个三维空间内为自己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过程就是美好社会的落实的过程。

基本假说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成员(个体)都会有对重要性的感受,而且这种对重要性的感受是惟一的。

正义维度；乙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那么他的坐标定位在发展维度；而丙在意的是情感，那么他的坐标定位在深层情感生活维度。诸如甲乙丙这样的一群人在 Agnes Heller 的三维空间内为各自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过程就是美好社会的落实的过程。所以，美好社会不单只是一个宏伟计划的实施或者是一位杰出领袖人物领导的结果，美好社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奋斗的结果。

基本假说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成员（个体）都会有对重要性的感受，而且这种对重要性的感受是惟一的。

我们假定社会的宪法或社会宪法的构成不会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梦想的权利。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类社会，即便是独裁社会也无法扼杀每一个人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每一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向着美好社会落实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过程中，由于他这颗种子的特殊性（uniqueness），他总会有对重要性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是惟一的。举例来说，甲对正义有着强烈的敏感性，他不能容忍非正义的事物破坏美好生活，他愿意付出很大的努力来纠正非正义的事物，那么他在正义的维度上有强烈的感受；乙（假定是位女性）对内在情感生活或对宗教有强烈的感受，她可能会创造出譬如一个人的宗教，那么她就会沿着深层情感生活这个维度发展。由于每一个人都是一颗 unique 的种子，每一个人都会对重要性有感受，而且这种感受是惟一的，这就是康德所指的“每一个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

这里需要精确表达重要性（importance）。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重要性”一词的含义，除了受到经济学自有传统的影响之外，还受到 Arrow（阿罗）和 Whitehead（怀特海）等人的影响。什么是“重要性”？（importance）这个词是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多次重复出现的关键词。什么是“效用”（utility）？Utility 是马歇尔经济学的出发点，最早是由休谟引入到经济学中的，之后亚当·斯密继承休谟的观点而发展，到了边沁时代，他把 utility 功利化而形成英美功利主义经济学（或称为效用主义经济学），这是边沁的曲解。

小密尔认为“效用 = importance felt”，即“效用是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怀特海提出“在理解之前先要有表达；在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千万不要受哲学家标准课程教科书的诸如“理解就是我们思维的开始”的误导，理解之前须先有表达，而表达之前须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阿罗告诉我们什么是“preference”（偏好）。由于每一个体在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都有对重要性感受的一个排序，由此需要引用阿罗的“偏好理论”，即，对重要性感受的排序理论。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对世界所有可能状态（世界上可能的状态有 n 种，假定这是一个有限向量，那么我们可以用阿罗的代数理论予以讨论）的重要性总有一个排序，这就是偏好。当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会呈现一种混乱状态；在这样一种混乱状态下会出现不可排序的意义，也就是在罗列重要性之后发现不满足排序基本假设的意义，即不满足非循环性的意义是不可排序的。今天，在北大、浙大和上海财大的经济系中，我的这套对重要性的诠释理论是最标准的，如图 3 所示。

基本假说 ——意义的阶梯不能够完整地呈现。

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把其对世界所有可能状态重要性的感受做出如 $\begin{pmatrix} x_1 \\ x_2 \\ \vdots \\ x_n \end{pmatrix}$ （这是阿罗讨论世界状态的

小密尔（John Stuart Mill）严复译作穆勒，（1806—1873年），逻辑学天才，边沁的学生，是19世纪承启英国经济学的大家。1848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评论为“此书填补了自斯密以来的英国经济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空白”。中国学者张五常认为小密尔是迄今的惟一的经济学天才。

参见怀特海，Modes of Thought《思维方式》一书前三章。

阿罗（Kenneth Arrow），《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此书中，阿罗首次用数理逻辑的分析工具，对社会决策和社会民主程序设计之间的关系做了形式化的深入考察得出“不可能性定理”，并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在“不可能定理”的开篇解释了“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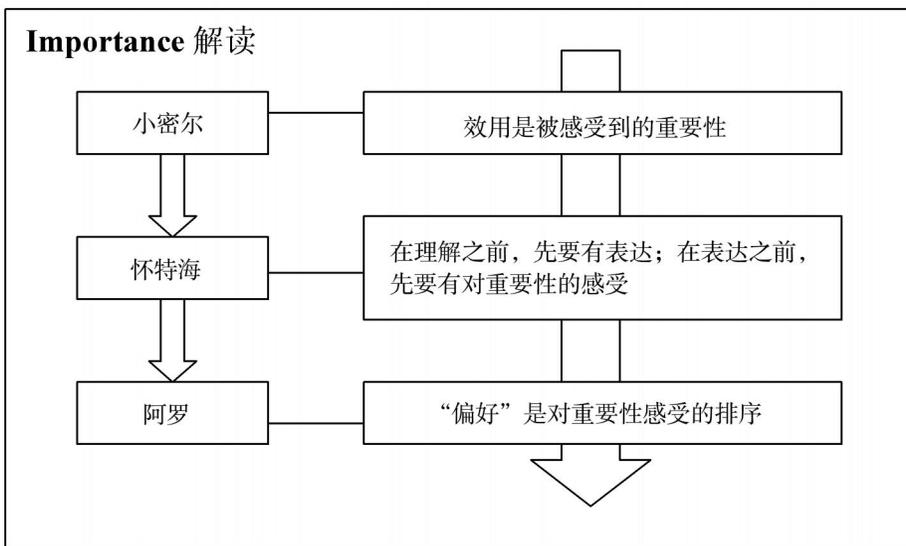


图 3

方法)这样的价值排序(这种价值排序对应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息完备假设”),那么意义的阶梯得以完整的呈现。但是自从 1900 年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至今,受西方发展历史轨迹影响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也是西方社会科学自 1900 年以来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也就没有办法把意义很好地

呈现给社会学家。这就是基本假说,意义的阶梯 $\begin{pmatrix} x_1 \\ x_2 \\ \vdots \\ x_n \end{pmatrix}$ 不能够完整地呈现,即 $\begin{pmatrix} ? \\ ? \\ \vdots \\ ? \end{pmatrix}$ 。

什么是意义的阶梯?

舍勒认为,价值(values)是有秩序的。请注意,意义就是价值,价值与效用是相关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都是围绕 value 展开的。价值对于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生命都是同一的(这是一种抽象的看法)。舍勒认为,价值有五个阶梯(价值是以阶梯形式呈现的,舍勒的价值阶梯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具有更深的思辨度)。正是因为意义的阶梯不能够完整的呈现给每一个

人,所以每一个人必须经由各自的生命过程去发现其价值所在,即发现其意义阶梯 $\begin{pmatrix} ? \\ ? \\ \vdots \\ ? \end{pmatrix}$ 是什么。例如文

革后期北京地下沙龙曾广泛流传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小说结尾的一句话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用以总结主人公所经历的一段生命过程。

所以,舍勒对价值理论和重要性的观点是:个体对其重要性感受的排序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或者,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年),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舍勒是德国哲学界继谢林之后的又一位博杂多方的学者,他涉猎了伦理学、宗教哲学、现象学、社会学、政治思想、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海德格尔认为“舍勒是全部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力量”。可以说,舍勒是一位天才,他如同一颗流星为欧洲思想界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参见弗林斯(Manfred S. Frings)编辑的《舍勒全集》,1954年出版第一卷,至1997年十五卷全部出齐。或参见[德]舍勒著,《舍勒选集:二十世纪思想家文库》,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柯切托夫(Kochetov, V sevold Anisimovich, 1912—1973年),苏联作家,著有《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和《青春常在》等等。

个体不能即刻洞察自己对重要性的排序,必须经过一个由他自己主导的探索过程,而这个探索过程同其独特的生命体验是无法分离的。

那么如何发现自我的价值?如何在自我的生命体验中找到自我价值的意义阶梯?这是第五个假说所要解答的问题。

基本假说——当个体被“comer”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冲突上的不同意义或不同原则,即他感受到痛苦,而这种痛苦导致其抉择。抉择是一个“断然一跃”的过程。个体抉择的结果有两种——个体或者升华,或者沉沦。这就是文化创造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发现意义的过程。

当个体(社会成员)被comer(comer,指被“迫”到一个角落,即无地彷徨)的时候,他感受到同等重要或者同等有利的两个不同意义或不同原则的冲突,康德将之表述为个体“被夹在两个同等有利的原则之间”感受到其人生的痛苦,这种痛苦导致个体的选择行为。这种选择不再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自由选择,而是抉择(decision),是不能依靠理性引导来作选择的决断力,是“断然的一跃”,是存在哲学第一人泰勒的“非此即彼”(either-or)。在这“断然的一跃”的过程中,詹姆士和舍勒认识到,个体或者得以向上而升华,或者被命运击碎而沉沦。这就是泰勒所指的文化创造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发现意义的过程,即必须于生存困境中求得“断然的一跃”的努力,才能把个体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才是“文化的创造”(culture creation),这也是舍勒发现新的意义的过程。

3. “问题性”的界定

前言述及,人文学科所致力于呈现的意义,是指人的个性与群性在各种情境之内发生的“问题性”。什么是“问题性”?“问题”的英语表达是“problem”。而“问题性”是一个法文词,“problématique”。刘东将“problématique”译作问题性,此译法值得商榷。因为,林毓生认为这种译法有悖于史华慈的本意。史华慈研究的是法国启蒙运动,在这一传统下,problématique指的是整个人类出了问题,林毓生将problématique解释为“不可救药的”,这是“问题性”这种译法所无法体现的。但由于其他译法背离更远,所以我暂时只能沿用刘东的译法。史华慈是林毓生的老师,是中西学界公认的汉学专家,是引入“问题性”研究的第一人。史华慈临危时嘱托林毓生将其所著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1999)一文翻译成中文首先在中国发表,在此文中,史华慈解释了“问题性”。

问题性,是类似于哈姆雷特所提出的生死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每个人都是惟一的,在不同情境中(情境 situation对个体而言是惟一的,因为他人无法进入到个体特有的具体情境中,这是个体的惟一体验。我最近10年所致力于的问题,即我们的理性应当是情景理性)体验到个性和群性的问题(个体被comer于各种价值冲突或伦理困境之间,为了保存个性,个体不得不损害其群性,或者为了保全群性而不能保存个性。例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忠孝两难全”,这种问题是无解的),这就是问题性。当个体获得升华时,也就是如Agnes Heller所言的向某一抉择断然的一跃并且成功了,那么个体就化解了其人生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对他而言,他发现一个新的意义,这就是创造。

所以,人文学科旨在于各种情境内将每一个体的个性和群性凸显出来。人文学者也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选择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体现其所发现的新意义,来表达其“惟一性的体验”。在“惟一性的体验”中,人文学者才可能回答“问题性”,才可能创造新意义,这是人文学者的任务。

三、科学——表达因果关系

科学的宗旨是呈现出因果之间的关联。牛顿和怀特海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表达因果关联。

牛顿的静态因果表达——世界是由众多实体构成的,因果关系是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1915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发了牛顿静态因果表达的危机。受爱恩斯

参见汪辉,《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辉是国内研究鲁迅颇有建树的学者。

参见本杰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刚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1999)一文收录“王元化和林毓生的往还通信”《财经》,2005。

因为小说对创新的要求很高,如果一部小说同其他作品有50%的内容是雷同的,那么这部小说是无人问津的。

坦的影响,怀特海于 19 世纪 20 年代提出一种新的、动态的因果表达,即过程表达。

怀特海认为,这个世界是十分东方化的,是一个如同大海般此起彼伏的过程。一束过程依靠某些缘分得以聚集、凸显、纠合成一个实体,而这个形成是很偶然的。即,过程的偶然聚散形成实体的存亡,这是怀特海用过程表达的因果之间的关联,科学的诠释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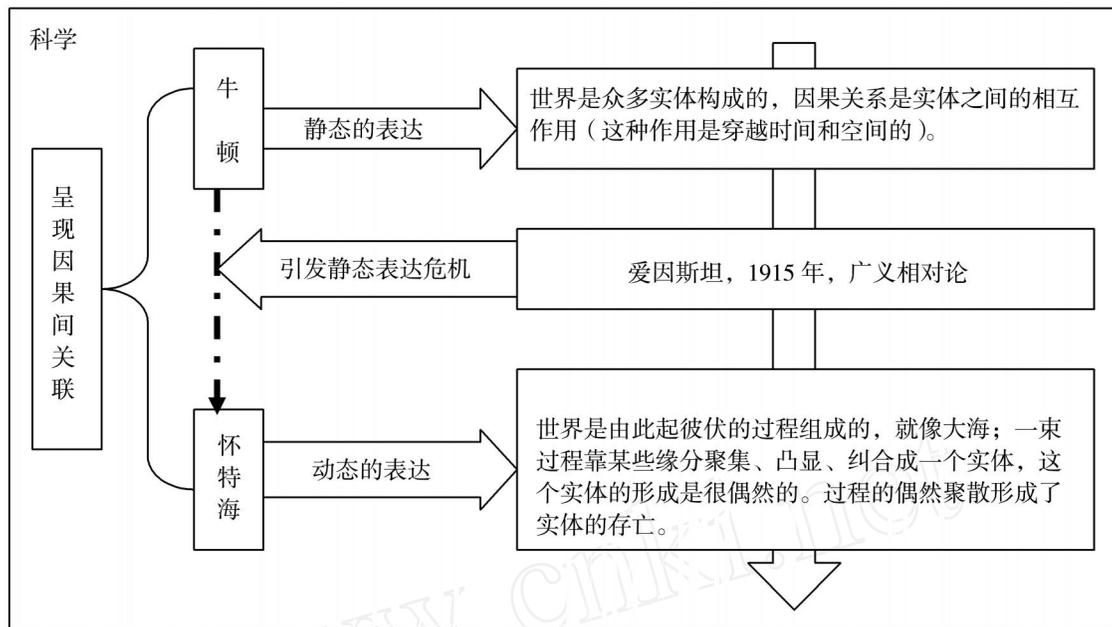


图 4

四、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传统

在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传统中,作为思维的方法,逻辑是自成一统并且是置顶的。逻辑与经验无关,是先验的(这是康德的观点,即,逻辑的真伪无需向经验世界求证)。所以无论是人文叙事(即, discourse, 寻找意义)还是科学叙事(即,用牛顿或怀特海的方法表达因果关系),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传统的逻辑前提而进行的,即三大逻辑定律。

三大逻辑定律——同一律($A = A$)、矛盾律($A \bar{A}$)和排中律。(详见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1992年)和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此外,从中国哲学角度看,康德的“逻辑与经验无关”观点未必成立。如果遇到李泽厚,康德也许会改变这一观点。李泽厚于 2004 年从实践逻辑的角度驳斥了同一律,他从居于 A 和 \bar{A} 之间的灰色地带(既属于 A 又属于 \bar{A})进行阐述。

三大逻辑定律是先验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是体验的,而科学也是可以重复地客观地体验的。首先承认三大逻辑定律,之后,用逻辑的方法表达人文或科学的感受,从而实现体验。所以,三大逻辑定律之于西方学术传统是很重要的。

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传统认为,必须用三大逻辑定律(后来,西方以塔尔斯基为代表的逻辑学派之华沙学派抛弃了排中律,该学派认为满足同一律和矛盾律即可)来表达个体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用逻辑定律来表达因果关系,才可能是“言之成理”的。这个“理”意指“理智”。理智是一种精确的定义,例如,“我在说话,同时我不在说话”,违反矛盾律,在西方人看来是不理智的也是无法接受的。同时,西方学者也感受到大量的无法用逻辑定律或用理智的方法表达的重要性的感受,他们称之为“神秘主义学说”(神秘主义学说是始终存在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潜流。譬如巫师的感受,在西方 2 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一直存在,却只有 200 多年是受排斥的,它经历了“烧死女巫运动”重要性仍然被感受 灵学

1927 年,怀特海受邀在爱丁堡大学的季福讲座演说,该次讲稿于 1929 年出版为《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从而为“过程哲学”奠定基础。“过程哲学”又称“发生哲学”,因为它阐释了万物发生的原因。

排中律指任一事物,它或者属于 A ,或者属于 \bar{A} 。西方对排中律的争议较大,这里我们暂不考虑。

海德格尔,《Identität und Differenz》(同一与差异)(1957),英译本 John Stambough,《Identity and Difference》,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此书讨论的主题就是同一律和矛盾律。

会复出),即,不能够用西方的理智逻辑表达但是还具有重要性的感受。“神秘主义学说”包括心理学,如“in depth analyst”深层的心理分析学家(荣格的心理分析被尊为西方心理学的正宗)、神话学和弗洛伊德的释梦等等。

以上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的介绍,即西方人所感知到的重要性,一部分可以用逻辑理性来表达,而相当一部分不能用理智只能用神秘主义来表达。

五、中国的思想传统

李零认为,中国宋明600多年以来的理学研究,因缺失了埋于地下的竹简作为论据支撑,需要重新回归到孔子的72弟子学说中以找寻中国的传统。

请注意,中国的思想传统所感受到的重要性不遵从西方逻辑,而是“与情境相应”的。因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置顶的不是逻辑而是“文字学”。

中国人借助于一套特殊的表意文字表达感受。根据所阅读的大量资料和已有的学者论证,我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每一个中国汉字与其应用之初的具体情境是不可分离的。换言之,中国汉字有其情境意义,是“与情境相应”的。这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埃及文字已“死”。失去了赖以存续的金字塔情境,埃及文字如何能“重生”?又如甲骨文、玉文、陶文,失去了与之相应的情境,也无法被后人理解。而汉字能够得以存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仍保有其使用的情境,只不过这个情境发生了变迁。

情境随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所以当今的中国人不甚了解孔子时代的情境(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即,除非还原孔子当时相应的情境,才能使当代人感受到同样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人的体验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表达的重要性感受。但中国人不遵从西方逻辑定律,即不认为理智是至高无上的;而是秉承“与情境相应”的思想传统,认为只要“与情境相应”就可以见字了义。换言之,中国人的思想传统是“心性之理”(这个“理”,不是“理智”之义,而是“理性”之义),只要同在一个情境中,即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中国人体验中的这一部分不能够表达的重要性感受,不是因为不符合西方的两大逻辑定律不能够表达,而是因为“文字与情境合一”(如颜回的得境界,又如参话头的情境要求)。“情境相应”表达的是中国人对重要性感受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是“文字与情境相应到合一的程度”而无法表达的感受。这一点与西方的“神秘主义”有异曲同工之义。中西方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和差异的分析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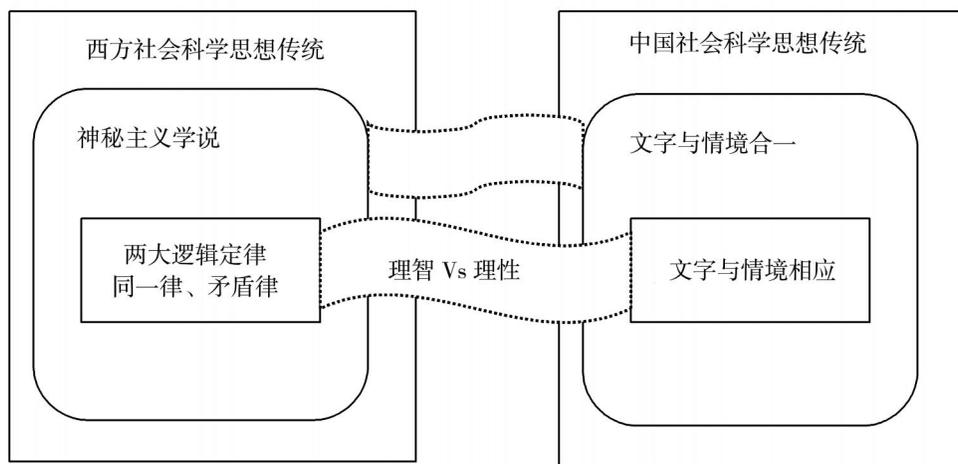


图 5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人往低处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李零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和上博楚简的主要破译者。

详见牟宗三的《周易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牟宗三先生是中国融合康德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的大家。

六、中国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若想了解中国社会科学根本问题,须得知晓中国社会科学应当如何?

1.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用逻辑方式展开其科学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既然称之为“科学”,就应当用科学叙事方式来表达感受体验,应当用逻辑方式表达意义,这样的中国社会科学才是有创造性的,否则,它只能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殖民地。但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用西方的理智方式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感受,很难。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所要表达的是对中国人而言有意义的、值得表达的感受,是能够反映中国人生存痛苦的感受,是对每一个中国人被逼到无路可走地步时的感受的表达。小说《在社会档案里》(1978)的作者王靖认为,表达中国人超越其生存痛苦的升华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在同王靖接触的过程中,他说“真正勇敢的人,真正有生活勇气的强者往往是被我们称作并呼吁社会关注的所谓的‘弱势群体’这样一群人”,由此我感受到重要性并得以重新明确了“强者”和“弱者”的涵义。)

因为没有表达中国人生存的意义,而中国人生存的意义是中国人所感觉到的重要性,所以对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首要的是对重要性的感受,其次是表达(如我同王靖接触后对强者和弱者的感受;又如,毛主席最早意识到对重要性的感受和表达问题,所以让“言必称希腊”的知识分子下乡感受重要性,是有一定道理的)。

2. Agnes Heller三维空间的中国涵义

中国人对重要性的感受用 Agnes Heller 的三维空间如何表达?

第一位,发展——温饱、工业化、资源、文化遗产和环保。

中国人在这个维度上的感受最多。对中国而言,发展是无法忽略的一个维度,没有发展,平等就无从论及。中国近 30 年的发展问题主要是温饱、工业化、资源、文化遗产和环保等问题。但这一系列概念,只对于切身感受到或感受过贫困的人而言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

第二位,正义——分配、改变制度、意识形态瓦解、政治权利(right利益)和 Power 的监督。

第三位,情感——家庭关系、办公室(office)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宗教和信仰、私人体验和升华(超验),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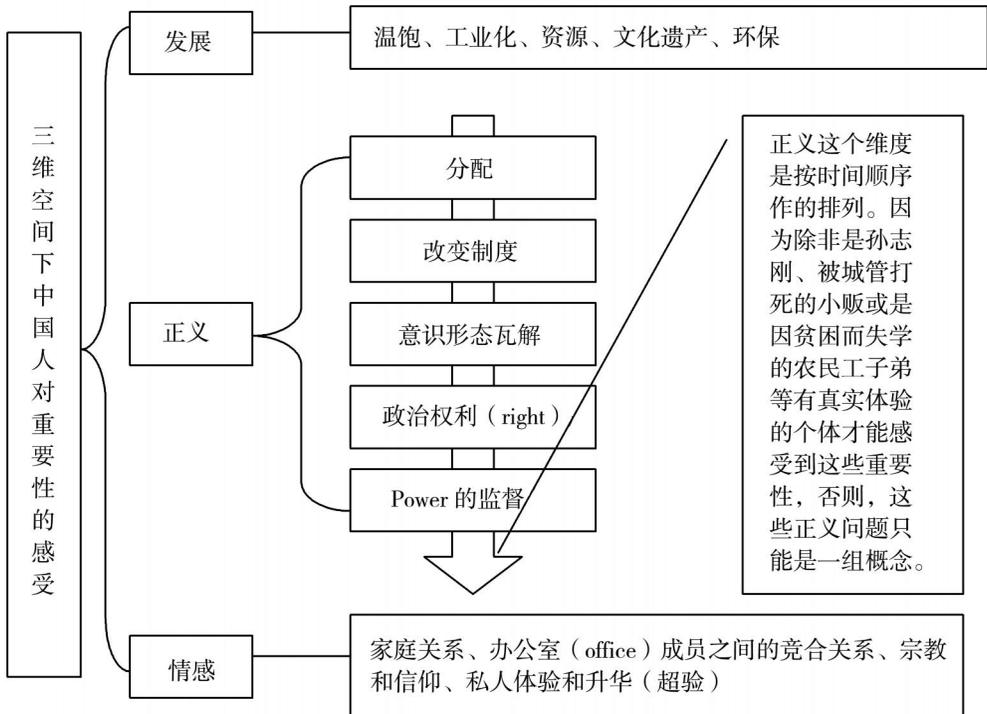


图 6

所以, Agnes Heller 三维空间的中国涵义是围绕上述三个维度展开的真实的中国叙事。关键是需要通过热爱生活的体验来发现问题——“议题”(issue)。

3. “issue” “commitment” “中国问题”

对于议题的解释, 康德和詹姆斯各有表述:

康德——issue 是两个或多个相互冲突(无法回避)的同等有利(被 comer 无路可走)原则的展现。

詹姆斯(美国心理学会会长)——两个同等有利的原则相互冲突, 并且每一个原则对个人而言都具有生存意义。

请注意, 两个同等有利原则的冲突可以是一个 issue, 但是对于个体而言, 未必会引起该个体情感的波动。例如陨石袭月, 这块陨石是来自火星还是来自木星? 这是个 issue, 但这个 issue 对于个体而言是无关乎生命意义的, 不能成为个体的 issue。此外, 詹姆斯的“对你个人而言有生存意义”意指那些对于个体而言无法回避的问题。举个真实的例子, 一位老兵迫于生活摆摊出售他的军功勋章。这些军功勋章对他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珍品, 是有生存意义的; 但现实的生存困境对他同样是有生存意义的, 两个对老兵具有同等重要生存意义的原则相互冲突又无法回避, 将老兵 comer, 这是他的痛苦, 是一个值得反思的 issue。

当个体遭遇康德和詹姆斯议题的时候, 命运要求个体如何应对? Michael Polanyi(波兰尼)将之表达为“commitment”。

“commitment”是博弈论学者经常使用的词。在合作博弈过程中, 只凭 credible threat(威胁)未必能够达成合作, 前提是必须有一方“commitment”。例如甲乙二人的合作收益是 \$4, 不合作收益是 \$2。甲在乙面前将其不合作的收益 \$2 烧掉就是一个向乙表明决心合作的 commitment, 由此乙才能相信甲的合作诚意, 并采取合作策略, 双方各得 \$4 的合作收益。

“commitment”,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用 200 多页予以论证。即, 任何知识都是个人的, 都会引起个人意义的纠缠。因为知识要求个体“信托”, 要求个体投入, 要求个体用其生命与之撞击, 使得个体或者上升、或者沉沦。

当遭遇康德和詹姆斯议题困境时, 命运驱使个体做出波兰尼式的寄托, 个体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当然也有可能走向灭亡。个体只有走出困境才有可能创造文化。只有创造过文化的个体, 在躺在死床的那一刻才可以说“我活过”。(须知, “活”字很重要, 人生命的本质是创造。)

当个体和群体的 issue 密切相关或者重合的时候, 个体的工作才具有社会意义, 个体才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否则, 他所研究的问题只能是一个求解个人价值的中国人的问题而不能称之为中国问题。个体困境和群体困境重合的情况就是“中国问题”。

4. 中国问题

什么是近 200 年来激发中国社会持久创造力的中国问题(fundamental issue)?

中国问题是中华文化遭遇外来文明(西方文明)冲击后所发生的文化身份危机。文化身份是我的译法, 原文是“文化认同”, 即对中国的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过去的 200 多年中, 中国问题表现为文化身份危机, 即如何界定中国人成为问题。因为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无从回忆中国人曾经如何生活过。自幼没有经过私塾教育, 没有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境熏陶, 当代人又如何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 “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发生危机, 这就是中国问题。

在过去的 200 年中, 中国人为求解这一文化身份的危机, 尝试过各种途径: 推翻帝制、各种改良运动、复辟、内战、土地改革、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等等。一班志士仁人对中国问题的求解所作的诸多努力,

参见 Michael Polanyi(波兰尼),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1958)。“Personal knowledge”, 中文翻译为个人知识, 没有显示出私人情感, 不是很确当。“Personal knowledge”强调的是私人的, 是对个体而言有意义的知识, 是同公共知识对应的。Polanyi 在此书中将“commitment”翻译为“寄托”或者“信托”。

参见汪晖导读的,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此书中, 吉登斯阐述了“文化认同”观点。

identity, 用数学语言可以表述为恒等式, 如 $A = A$; 但在文化中被译作“认同”, 或者译作“身份”。

李泽厚将之概括为——过去的两个世纪是“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

“启蒙”和“救亡”是中国士大夫、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启蒙”，例如，父老乡亲合力供一个孩子念书，他中了举人、进士之后要回乡办私塾来教育未发蒙的同宗子弟，这就是“开启民智”，是过去中国绅士的“启蒙”运动的方式。而当中国问题发生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时，“救亡”任务压倒“启蒙”任务。但是在救亡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想要救亡首先得启蒙（开启民智），所以有了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致力于改造农民、改造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

如果一个 issue 是一个民族的根本问题，那么这个民族在过去的 200 多年中所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头脑一定会感受到这一重要性，然后选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林毓生用其博士论文《中国意识危机》作为其在英语世界里对“中国问题”的表达（“意识”一词，林先生用的是 consciousness，是对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的表述）。80 年代后期，也就是“文化热”的末期，林毓生又提出，“中国问题”是“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代表了 80 年代后期人们所认同的一种观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是秉承其师哈耶克的保守自由主义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新传统的挑战（commitment）的一种回应，见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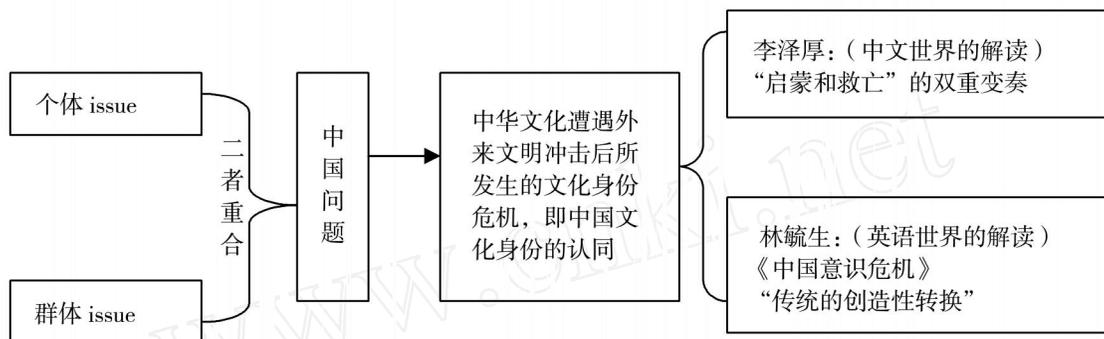


图 7

此外，如果个体意义与整体意义是完全分离的，或二者的相关性很小，即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但与群性无关的个体 issue，如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也是一种创造。

所以，中国社会科学家应做到（见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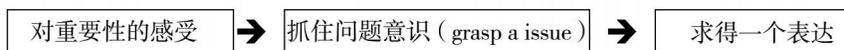


图 8

但中国社会科学家最大的困难是难以用理智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表达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困境”。须知，若想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不能仅仅依靠编纂几部《中国百科全书》，或是举办几场学术交流会议，或者输出孔子学院；需得让西方人来到中国切身感受到真实的中国文化情境，让西方人“与情境相应”才能使之真正了解中国。

我搜集、整理了近一年半的《中国社会科学》，其发表的文章中最常见的有两类：一类是用数理方式表达的对西方而言有意义的文章，此类文章具有学术合法性，但是缺乏中国意义。另一类是乡土中国的文章，此类文章缺乏学术合法性，却表达出对中国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文章的评述，我得出的结论是——“表达”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因为当我们中国人用西方逻辑传统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缺乏学术规范或者学术合法性，所以，学术合法性是中国社会科学家最根本的困境。

（待续）

（责任编辑：杨全山）

详见李泽厚三本著作之一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

《中国意识危机》一文是林毓生先生 60 年代用英语所作并于英语世界发表，由于得到其师史华慈的赞许和鼓励，林毓生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将此文译为中文在中国发表。